

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多樣性： 蘇州與溫州的比較¹

（初稿，請勿引用）

吳翰有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發表於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兩岸社會現代化』學術研討會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辦
2007年10月23日

¹ 本文為我的博士論文研究計畫第一章的部分內容，敬請指教。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畫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總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002：372-373）

中國經濟改革過程的研究，儼然成爲國內外社會科學的新興研究領域。「中國研究」的重要性，至少顯示了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1978年，中共中央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經濟成長快速，其對外開放的政策，吸引大量外國資本的投資，並促使中國加速融入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結構，厚實了中國對世界政經事務的影響實力。對內部社會而言，中國的經濟制度轉型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企業組織的生產方式、以及政府與社會的協調模式等。就以上現實意義而言，中國的改革開放，如何改變國際與國內在經濟生活結構上的變遷，值得關懷。第二層意義，中國的改革過程，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遇（周雪光，1999:169）。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大多環繞著西方資本主義體制而發，探討資本主義體制的起源、結構與模式特徵等面向。資本主義的多樣性（varieties），已是西方社會科學對資本主義體制的共識（Albert，1993；中譯：莊武英，1997；Whitley，1999；Dore，2000；Hall and Soskice，2004）。中國、蘇聯與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如今紛紛改弦易轍，轉向建構國內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變遷，究竟對其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帶來什麼影響，而這些影響可能產生什麼後果，無疑地，這一向是社會學關懷的核心。因此，中國的改革過程，也就成爲學術界在理論建構與研究的新練兵場。

一、研究背景

當我在1999年，首度進入中國，對蘇州台商的投资模式蒐集田野資料時，

我的關懷重點在於，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所衍生出的生產模式究竟與其在台灣的生產模式有何差異？我的結論是，蘇州台商（資訊產業）幾乎群聚在蘇州市區（蘇州高新區及蘇州工業園區）、昆山與吳江的各經濟技術開發區內，並且採取在台灣慣用的生產協力網絡進行各類資訊產品的加工與組裝。生產模式基本不變，產生變化的是這張網絡內的廠商組成結構。同時，這張外移到蘇州的生產協力網絡依舊深刻地受到其全球商品鍊的等級權力制約（吳翰有，2001）。隨後幾年，至今年年初（2007年），我多次進出中國大陸的沿海城市（大多仍集中在蘇南與蘇中地區），不論是蒐集資料或探親，這些經歷除了幫助我更認識和融入大陸當地的生活習俗與人士風情之外，至於縱向的改革力量如何形塑當下的社會經濟生活，彷彿只能從歷史中去追尋這些制度脈絡的變化。

隨著台商及外商在蘇州的投資數量與技術、資本層次的提高，已經改變了蘇州的經濟結構與生產體制²。在計畫經濟體制內與改革初期，由於市場機制的成熟，蘇州地方政府具有強勢主導當地經濟成長的行政能力及權力，以集體經濟為基礎的鄉鎮企業帶動農村工業化的「蘇南模式」，即為此中典型的發展路徑。但是，伴隨著 1990 年代中後期鄉鎮企業的產權改制，外資的大量投資，以及中央政府對原有計畫經濟制度的鬆動，相對促進市場機制的日漸成熟。在如此制度變遷的背景之下，我們如何動態的掌握蘇州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以及蘇州如何建構源自於其獨特地方制度的生產體制？

2007 年寒假，我帶著上述的關懷在蘇州待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基本以民營企業作為考察的對象。蘇州城區在景觀上的劇烈變化，倒是先吸引了我的目光。由於我對台商研究的厭煩心理，導致我企圖將關心的對象轉移至蘇州的民營企業身上。事實上，蘇州政府在 2004 年即開始透過政策手段，提出一系列扶植民營企業發展的配套政策³，這本應是一個適合切入觀察民營經濟發展的好時機。但是，這次的田野經驗卻告訴我，想要研究民營企業，必須到溫州，溫州才是民營企業的大本營。溫州的地方經濟發展路徑，明顯不同於蘇州。溫州在改革開放之後，以家庭工廠的專業分工型態，從傳統產業入手，包括鞋業、皮革、文具、低壓電器、眼鏡、乃至打火機等，帶動了溫州的經濟成長。其間企業的產權結構數度變革，從私營的家庭工廠、到掛戶經營、股份合作制等不同產權形式的演變，但產權私有的制度在屢次的企業組織調整過程中並未有過根本的改變。而專業分工的協力生產方式也持續維持至今。此外，若將蘇州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視為強勢政府，那麼相較之下，溫州地方政府則是一個弱勢政府。這次的田野經驗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亦即蘇州與溫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

² 請見本文第三節的說明。

³ 2004 年初，蘇州市委及市政府公布〈關於促進民營經濟騰飛的決定〉（蘇發〔2004〕1 號），提出到了 2006 年底，蘇州市民營經濟基本實現主要指標比 2003 年翻一番的政策目標。不久，又陸續公布相關的指導性文件。

從蘇州與溫州的個案，引發了一連串有趣的問題。理論上而言，從 1958 年後，中央政府對地方實施多次的放權讓利政策，即中央要求地方成爲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由省、市、縣、鄉、鎮、村等，從上到下的等級科層組織均自成一體，多層次、多區域的「深 M 型經濟管理組織」（錢穎一、許成鋼，1997），以降低地方對中央的經濟依賴及完成其他政治目的。從這個歷史脈絡來看，地方政府組織應該具有同質化的結構與功能，並且具有共同的制度共識。但在實際發展地方經濟的過程中，卻往往出現不同調的發展路徑及結果。從這個角度切入，倪志偉（Victor Nee，1989）的「市場轉型論」並未能合理的解釋在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發展過程中，爲什麼地方幹部壟斷再分配權力的持續現象。另一方面，倪志偉的觀點或許能部分說明溫州民營經濟的活力來自於市場與產權私有化的誘因，但我認爲經濟生產活動的組織方式與在地制度，或許更能具體的說明溫州的實際情況。此外，溫州的地方政府與私營企業的關係，更像是 Wank（1999）對廈門的研究所提出的「共生侍從主義」（symbiotic clientelism）。至於戴慕珍（Jean C. Oi，1992、1999）的「地方政府公司化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或魏昂德（Andrew G. Walder，1995）的「地方政府即廠商」（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的分析概念，對於蘇南地區或有較強的解釋力，但這組論述卻忽略了蘇南地區非正式制度對財產權所造成的制約（陳志柔，2001），以及忽略了「關係產權」（周雪光，2005）的中國社會經濟制度特色。除此之外，戴慕珍與魏昂德的分析概念也無法對溫州地方政府的行爲提出令人滿意的答案。Whiting（2001）從環境及個人兩個層次解釋蘇南與溫州的產權模式變化，指出地方官員在政績主義的壓力與中央的政治干涉之下，只能依循路徑依賴的決策，亦即尊重蘇南的集體產權及溫州的私人產權，在既成體制下設法使收益最大化。但是，Whiting 的分析，忽略了「非正式制約」（如關係、網絡等）對蘇南與溫州產權制度變革的影響（引自方孝謙，2002）。到目前爲止，蘇州與溫州的經濟發展路徑比較，依舊是中國媒體與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之一。

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往往出現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局面，某種程度說明了中國地方的異質性遠超過研究者的想像。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從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計畫經濟體制中解放，將原本趕超戰略下扭曲的產業結構（林毅夫等，2000）逐漸恢復到以比較利益優勢的產業結構，依序追求工業的現代化。現代工業化的發展，意味著工業活動的組織型態，除了生產要素（土地、資金、技術、勞動力等）之外，還有一套支持工業生產活動的社會制度及社會價值觀的存在（Hollingsworth and Boyer，1997），以協調市場及科層體制。不同的社會生產模式將會引導出不同的協調機制，進而產生不同的生產體制，如自由式市場經濟體制（LMEs）及協調式市場經濟體制（CMEs）等（Hall and Soskice，2004）。

除了國內社會生產體制的影響之外，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也會影響著社會生產體制的制度變化。如象徵全球化經濟力量的外資在中國投資的分佈，各地方

的區位條件對外資的吸引力等，都有可能加深了全球化對地方生產體制的雕刻程度。以製造業生產為主的外資大多利用中國低廉的生產要素從事加工出口的生產活動，外資技術擴散的自主性以及地方政府互相競爭外資的集體行爲，未必能有效地通過外資的投資而提升當地的技術升級。然而，地方政府爲了服務外資的生產活動，卻往往必須提出相應的優惠政策及制度，以留住外資並配合外資的各項生產需要。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在政治與市場相互協調而產生的地方生產體制，通常又存在著路徑依賴的制度慣性，因而導致了地方經濟發展的多樣性。

二、問題意識

研究中國改革過程裡，中國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關係，成爲一組重要的解釋變項，亦即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中國經濟改革政策的制訂率多由中央政府決策，實際的執行者爲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放權讓利，源自於毛澤東在政府行政層級的改革，他要求各地方成爲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鄧小平的放權讓利政策，則在於深化地方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的干預能力，以提高地方經濟的生產力以及寄望由市場的引進，改革國內經濟體制。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呈現出多層次、多地區的「深 M 型」經濟管理體制的特色，迥異於蘇聯東歐的「U 型」經濟管理體制（錢穎一、許成鋼，1997）。中國的「深 M 型」經濟管理體制有利於採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由於全國各行政與經濟組織形成單獨的塊狀，某項改革政策在某一地區的試驗失敗，並不會波及全國；假如試驗成功，則可推廣至全國。但是，地方政府又受限於在地制度的差異，在承受中央政策之後，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扭曲或重新解釋中央政策，在政策的落實過程中，通常以追求地方利益爲優先。而且，距離中央權力愈遠的行政層級單位，政策執行的自由度愈高。中國「深 M 型」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徵固然爲漸進式改革的步驟帶來優勢，並且是中國政經體制的主要特徵，但卻無法進一步解釋地方發展路徑爲什麼會出現差異。此外，部分城市對外開放的時間與條件類似，但在改革過程中卻發展出迥異的地方經濟發展路徑，如蘇州與溫州，這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地方。大陸時興的「模式之爭」，即可謂是地方制度差異辯證下的產物。因此，以區域作爲分析單位，在研究方法上採取「個案分析」的比較策略，乃是瞭解中國社會群體的分化組織、制度設施間的相互作用、微妙和多元演變過程、新制度形式的產生和運作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周雪光，1999）。本論文即從區域的角度出發，探討中國地方經濟改革過程中的相關議題。

中國的幅員遼闊，各省市的地理、人文、歷史、文化等制度差異極大。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所倡導的「先富論」，首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改革與成長。經濟結構轉型的力道與方向，也由南向北，從深圳、廣州爲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逐步蔓延至以上海爲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及至以京津爲中心的環渤海經濟

圈。這三大區域經濟圈，除了開放時間有先後之別，同時各自有著迥異的產業特色，彼此之間也存在著競爭關係。個別深入三大區域經濟圈，內部也往往有著所謂的「模式之爭」，亦即城市之間或地方之間在發展路徑上的優劣比較。發展路徑難有對錯的評比，因為各地之所以採取相應的發展路徑，是一種歷史與結構等因素所造成的結果，是「因地制宜、不同模式」(費孝通，1994)。

我的問題意識便是建立在「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基礎上。既有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國有企業與鄉鎮企業在市場過渡時期的產權改革議題，指認市場化對政府角色與廠商行為的相互作用，辯論的焦點仍集中在中國私有化的程度。然而，對於 1990 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對外開放的程度日漸加深，以及市場競爭越趨激烈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如何治理現代企業組織，如何營造地方的技術體制以從事產業升級，以及打造更廣泛意義下的生產體制以統合協調當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則仍是一個有待開拓的研究議題。

三、蘇州與溫州的描述

在本節中，我將對蘇州與溫州的經濟發展過程作一素描的工作，指出兩個城市大致的地方發展特色。然後，以進一步導出我的研究問題。

3.1 蘇州與溫州的國民經濟概況

蘇州市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風景旅遊城市，也是長江三角洲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蘇州自古以來即是聞名遐邇的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素有「人間天堂」的美譽。就地理位置而言，蘇州位於江蘇省東南部，東臨上海，南接浙江，西抱太湖，北依長江。全市面積 8,488 平方公里。2005 年末全市人口 607.31 萬人。蘇州市下轄張家港市、常熟市、太倉市、昆山市、吳江市，吳中區、相城區、平江區、滄浪區、金閶區，以及蘇州工業園區和蘇州高新區(虎丘區)。1985 年，對外開放。1993 年，被國務院批准為「較大的市」。目前，蘇州市為地級市⁴。

溫州市位於浙江省南部，傍山臨海，全市面積 11,784 平方公里。2005 年末全市人口 750.28 萬人。全市下轄鹿城、龍灣、甌海 3 區，里安、樂清 2 市及永嘉、洞頭、平陽、蒼南、文成、泰順 6 縣。溫州亦為地級市⁵。

⁴ 中國蘇州網站。

⁵ 中國溫州網站。

表 1-1 蘇州與溫州的主要經濟指標（2005 年）

	蘇州（Suzhou）	溫州（Wenzhou）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8,488	11,784
人口（萬人）	607.31	750.28
地區生產總值（GDP／億元）	4,026.52	1,587.60
人均生產總值（元）	66,766	21,218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億元）	9,908.58	2,243.97
進出口總額（億美元）	1,405.89	78.60
出口總額（億美元）	727.75	61.84
合同外資金額（億美元）	153.40	8.91
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美元）	51.16	3.57
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億元）	316.78	109.61
市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6,276	19,805

資料來源：《2006 蘇州統計年鑑》，2006：576-577。

2005 年的數據顯示（見表 1-1），不論就地區生產總值、人均生產總值、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進出口總額、合同及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及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等經濟指標，蘇州均高於溫州。但，市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溫州以 19,805 元（人民幣）高過蘇州的 16,276 元（人民幣），有 3,529 元的差距。從表 1-1，大致可以掌握蘇州與溫州的經濟情勢。各項指標，蘇州都遠超過溫州的表現，如地區工業產值，蘇州大約是溫州的 4 倍；依序，進出口總額是 18 倍，合同外資金額是 17 倍，實際利用外資是 14 倍，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將近 3 倍。從這幾項指標，可以大致看出蘇州的工業生產規模較溫州高，而且蘇州也較溫州更為依賴外資及進出口貿易。倒是市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溫州大約是蘇州的 1.2 倍。

3.2 蘇州發展路徑的回顧

蘇州當前的經濟表現是奠基於「蘇南模式」的基礎上。蘇南模式所涵蓋的範圍包括蘇州、無錫、常州，及其當時所轄的 12 個縣（市），由於這三個省轄市均位於江蘇省南部，故簡稱「蘇南」。「蘇南模式」一詞，最早是由費孝通在 1983 年 12 月提出，當時所指的是「蘇南這個地方在農村經濟發展上自成一格，可以稱為一種“模式”」：「蘇南模式，就是蘇南地區依靠鄉村社區自身的力量，和大中城市的經濟、科技、文化輻射相結合，積極興辦以社區集體所有的鄉村工業為主的鄉鎮企業，建設具有連結城鄉功能的小城鎮，發展城鄉之間的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的協作和聯合，推動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並促進城鄉社區、城鄉產業和城鄉社會生活向緊密結合的一體化方向發展的模式」（吳大聲、居福田，1994：24-27）。

在費孝通（1987）在《江村經濟》裡，他認為以江村⁶作為原型的蘇南模式，其起因在於一方面土地生產的糧食不足以供養當地的人口，因此自古以來養蠶、絲綢等家庭副業作為江村人民維生的主要副業；其次，解放之後，在社隊的基礎上建立了草根工業（grassroots industry），開始從事絲綢紡織之外的輕工業生產，以農民集體入股的方式為體，由當地政府幹部經營為用，逐漸形成了所謂鄉鎮企業的規模。

所謂的社隊工業，是指在人民公社時期，由公社和生產大隊、生產隊興辦的工業。公社和生產大隊、生產隊是集體的經濟實體，它有權在社員的勞動所得中積累一部份的基金，用來興辦集體公有的工業，因此稱為社隊工業。後來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時，蘇南農民並沒有把社隊工業分掉⁷。在改制的過程中，鄉和村分別繼承了公社和生產隊的企業，保存了集體的經濟實體，社隊工業改名為鄉鎮企業而繼續發展⁸。因此，可以說蘇南農村工業化是在公社制度中啟動的，啟動資金來自農民的集體積累（費孝通，1994）。就產權的意義而言，蘇南的鄉鎮企業是一種「地方幹部經營的社區所有制」，亦即採取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鄉辦鄉有，鄉辦鄉管；村辦村有，村辦村管。由於生產資料和生產經營成果屬於社區內勞動者所共有和共享，因而鄉村社區領導在管理上具有以下優勢：首先，保證能在社區範圍內對農、工、副各業和各種經濟、社會事業進行統籌以協調發展；其次，對社區內的各種資金、技術、勞動等生產要素能順利地進行統一調度或集中，有力推動重點項目的建設（吳大聲、居福田，1994）。在各類產業別中，以工業收入最高，1984年，工業收入佔農村經濟總收入的62.57%，到了1989年，提高到76.53%。機械、化工、建材和紡織四大產業，被稱為蘇南鄉鎮工業的「四大名旦」。另外，電子、皮革和服裝也佔有較大的比重（ibid.）。

蘇南鄉鎮企業的工業產值，從1978年之後，便快速成長。以蘇州為例，1985年，全市鄉鎮企業工業產值比1978年增加8.47倍，在農村經濟中的比重從43%上升到83.4%，在全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14%上升到46.2%。即使在1990年代初期，蘇州已開始利用外商獨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等「三外」的外向型經濟政策，以及在鄉鎮企業大規模產權改革前，蘇州的國有與集體企業的工業產值，在1995年仍佔全市工業產值的79.7%，在國民經濟中仍有其舉足輕重的地位（謝立新，2005）。從這個數據，可以反映出計畫經濟體制內的國有經濟與計畫經濟體制外的集體經濟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對蘇州國民經濟的重要性。但是，到了2005年，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佔蘇州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則大幅滑落，大約只佔了一成九，至於外商及港澳台的工業產值則佔了約54.7%，成為蘇州工業產值的主要來源。見表1-2。

⁶ 「江村」是費孝通所取的學名，實際為當時的吳江縣廟港鄉的開弦弓村（費孝通，1987：前言3-4）。

⁷ 可參見周怡（2006）對江陰市華西村的研究。

⁸ 可參見新望（2004）對蘇州張家港永聯村「永聯鋼廠」的研究。

表 1-2 蘇州市企業數與總產值及比重（2005 年）

單位：個；萬元（人民幣）

	蘇州市	國有	集體	民營	外商及 港澳台	其他	規模以 下工業
工業企業單位數	85,581	33	247	3,460	2,947	56	78,838
工業總產值	121230937	795454	1461460	29253079	66284364	1291486	22145094
百分比（%）	100	0.7	1.2	24.1	54.7	1.1	18.3

資料來源：整理自《2006 蘇州統計年鑑》，2006：148-149。

總體而言，蘇南鄉鎮企業 95% 以上是由鄉（鎮）和村集體投資興辦的社區所有制企業，是社區黨政領導機構直接領導和管理企業，政企不分、政企合一，鄉鎮黨政領導人集行政權、企業經營權於一身，以社區所有制企業資產管理者的身份，幾乎行使了企業所有者的全部職能（吳大聲、居福田，1994）。因此，蘇南模式的基本內容包括以鄉鎮工業為主體，和以政府推動為主導，此一形式反映著蘇南地區發展共同體主義價值的追求。在村、鄉（鎮）的範圍內，以工補農、以城帶鄉，走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注重公共物品和共同體福利的積累，這是蘇南模式當年吸引人的魅力所在（蘇州市“兩個率先”課題組，2006）。

1985 年，蘇州市被國務院列為沿海開放城市，享受國家對外開放的優惠政策。1980 年代後期，由於受到外資企業進入的競爭，以及鄉鎮企業本身的問題，導致後者的競爭力開始下降，蘇州政府開始調整發展策略，從內向發展轉向對外開放（劉志彪、張曄，2005），在資金、政策、稅收和引進外資等方面，皆具有相當的行政權力。其中，昆山首先自費籌建了經濟開發區，一開始以吸引上海地區的國有企業投資及科技人才為主。真正影響大蘇州地區採取「招商引資」的外資出口導向政策，源自於 1990 年，中央政府宣佈開發上海浦東的結果。蘇州政府利用毗臨上海的區位優勢，主動融入上海，實現外向型經濟和錯位發展策略。事實上，改革開放之初，蘇州市委、市政府就堅持把「學習上海、服務上海、接軌上海、依托上海」做為蘇州市重要的發展策略（張輝鑫，出版年待查）。1993 年，蘇州新區成立。之後不久，新加坡政府在 1994 年與中國政府共同成立新加坡工業園區，寄望將新加坡的發展經驗在蘇州加以複製。蘇州政府從新加坡政府身上學習到如何對待外資的政商關係模式，因而建立起「親商、富商、安商」的理念，制訂並實施〈蘇州市服務型政府建設綱要〉，大力改革行政審批制度，設立行政服務中心，建立所謂「一站式辦公」的行政制度（ibid.）。此時，在 1980 年代中期前往東南亞國家投資的資訊電子業台商，到了 1990 年代中期之後，由於當地生產成本的升高及國際客戶的要求，遂逐漸將生產基地移往中國長江三角洲，也有相當一部份的外資及台商從華南地區遷移至長三角。由於上海市政府設立了較高的投資門檻，以及製造業本身的規模限制，因此台商大多選擇在上海周邊的昆山及蘇州市區設廠。如明基（BENQ）在 1994 年，便帶著 14 家協力廠進

駐蘇州新區及吳江（吳翰有，2001）。

從 1985 年至 2005 年，蘇州市的出口導向經濟發展路徑已然成形。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6 年 1 至 9 月，蘇州市的進出口總額達 1239.7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22.7%，其中出口 667.43 億美元，進口 572.35 億美元，分別增長 28.9% 和 16.3%。進出口總額佔全國的比重為 9.74%，在全國中大城市中排名第三。蘇州出口貿易具有以下特徵：第一，加工貿易為主要的貿易方式，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達 924.81 億美元，佔全市進出口總額的 74.6%，其中進料加工貿易的進出口總額為 615.24 億美元，較同期增長 23.7%，也佔全市進出口總額將近一半，達 49.6%。其次，外商投資企業為進出口貿易主力。截止 2006 年 9 月底，蘇州注冊外資企業數達到 12,783 戶，佔蘇州注冊企業總數的 9.2%，外資企業注冊資金為 614.28 億美元，按現行匯率折算，佔全部企業注冊資金的比重達 56.7%。2006 年 1 至 9 月的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為 1127.18 億美元，較同期增長 22.4%，佔全市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 90.9%。最後，就出口產品類別來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的比重最大。2006 年 1 至 9 月，機電產品進出口額為 975.26 億美元，較同期增長 23.5%，佔全市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 78.7%。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額為 657.86 億美元，較同期增長 23%。其中，出口額為 386.93 億美元，較同期增長 27.4%。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額佔全部出口額的 58%。另外，私營企業的進出口總額為 55.17 億美元，較同期增長 97.7%，其中出口額佔 31.93 億美元⁹。

從上述的說明，大致掌握了蘇州經濟發展路徑的輪廓。地方政府在改革開放初期，在社隊工業的基礎上，將原有的工業型態轉型成鄉鎮企業，由社區幹部主導鄉鎮企業的生產與流通。在 1985 年，蘇州得到中央政策的進一步開放，逐漸將發展方向轉向吸引外商投資。1990 年之後，則在上海開發浦東新區的輻射之下，擴展了外向型的招商引資策略，由地方政府主導，成立了若干高新技術開發區，及一連串行政制度的革新，以完善當地的基礎建設及投資環境，藉此吸引外商投資。聚集在各高新技術開發區的外資及台商，特別是機電產業與資訊電子業的出口，成為蘇州出口貿易的主要產品。外資出口導向的發展型態，於焉完成。

3.3 溫州發展路徑的回顧

溫州市在計畫經濟期間，受到對台前線及三線建設的影響，長期以來國家對溫州地區投入的資源極少，從 1949 年至 1979 年的三十年間，國家投資平均每年僅有 0.2 億元（李雲河、鄭子耿，1994）。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單位具有政治社會化功能與社會控制功能，因而組成單位組織的公有企業在很大的意義上是政府控制社會的重要機制（Walder，1986；中譯：龔小夏，1996）。公有企業作為一個

⁹ 江蘇省經濟貿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jsctc.gov.cn/big5/jsjmw/sxjmx/userobject1ai40877.html>。

生產單位，不僅有著政治社會化的功能，也對職工提供相關的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從而達到職工對單位的依附等社會控制的功能。但是，溫州歷來國有企業比重小，國有經濟薄弱，加之溫州人多地少，社會成員不能在正統的單位體制內獲得充分就業，只能游離於體制之外，使得溫州不能形成一個將多數社會成員都納入強大控制的單位制度網絡之內。也因此，使得溫州缺乏對社會資源按照計畫經濟模式進行有效整合的載體，這種地方政經結構為零散社會資源的自發流動提供了機會和空隙，為溫州民營企業的生存保存了經濟基礎。即使在計畫經濟時期，溫州的民營企業的現象也始終存在，溫州政府之所以能容忍民營企業，客觀上而言，是溫州政府無力提供足夠的單位來安排民眾的就業問題，相對也反映出溫州政府較弱的社會控制能力（陳國權、麻曉莉，2004a）。

民營經濟可謂是溫州模式的主要內涵。在中國大陸，一般人只要提到溫州，便直接將民營企業與之聯想在一起。所謂的溫州模式，其主要特徵是以家庭為基礎的生產單位和以鄉村行政區域為範圍的生產群體互相結合，從事分工和協做，形成獨特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體制（李雲河、鄭子耿，1994）。生產上以傳統技術、簡易設備為主，並以專業分工為基礎，從事小商品的製造。然後，透過國內貿易形式，將溫州生產的小商品行銷全國，構成費孝通（1986）所謂的「小商品，大市場」的區域經濟格局。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大約經歷了四個階段（陳國權、麻曉莉，2004b）：

首先，1978-1983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共中央在1980年正式承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鼓勵農民在農業經營上的積極性和自主性。在溫州，則開始大量出現個體家庭工業形式的「重點戶」和「專業戶」。溫州地方政府為了滿足溫州發展個體經濟的需要，在1980年發佈了《關於對個體工商戶進行全面整頓、登記、發證工作的報告》，使得溫州成為中國第一個發放個體工商證照的城市。1982年底，溫州地方政府推廣重點戶和專業戶的經驗，提出大力發展農村家庭工業和街道工業的發展方向。這個階段，是家庭工業在溫州取得地方政府承認的階段。

其次，1984-1987年，是地方政府在家庭工業大量興起之後，採取若干政策創新以扶植家庭工業成長的階段。1985年，地方政府對「掛戶經營」做出了支持性的規定，強調「部分社員集資聯辦的企業、各種形式的合作工業和家庭工業都是鄉鎮企業的組成部分」，並且「農村家庭工業允許在本鄉鎮村辦企業中掛戶經營」。然後，溫州政府又頒佈「關於轉發〈溫州市稅收管理暫行規定〉的通知」，對掛戶企業的稅收問題作了規定。1987年，修訂「溫州市掛戶經營管理暫行規定」，為掛戶經營提供正式的政策依據，化解了民營企業的合法性問題。

所謂的掛戶經營，是指各種不具備獨立的生產經營地位的家庭或個人，以及它們之間的聯合體，將其生產經營活動掛靠在具有法人資格的公有制企業（或政

府)名下,以便開展其業務的一種經營方式。根據掛戶者與被掛戶者的權利義務關係,大致可以區分兩種不同型態的掛戶經營。一種是所謂的鬆散型掛戶,就是被掛企業對掛戶者提供「三借」服務,即出借介紹信、合同書、銀行帳戶,但只限於向掛靠者提供公章、合同書、介紹信、統一發票的使用權,同時代徵相關稅款。除此之外,不提供任何其他服務,自然也不承擔掛靠者的經濟糾紛和經營責任。而掛靠者則必須按照營業額的一定比例或掛靠時間向其繳納管理費。這種掛靠經營形式也稱為「虛掛」。另一種是所謂的緊密型掛戶,就是掛戶企業不僅向掛靠者提供三借和四代(代開統一發票、代為建帳記帳、代徵國家稅款、代交集體提留)服務,還向掛靠戶提供生產經營訊息、技術服務、甚至還提供設備、原材料,並且對下屬的所有掛靠戶進行統一資源調度、統一規劃興辦公共事業、統一產品檢驗、統一行政領導和經濟管理。此外,還協助處理經濟糾紛,在資金調度與對外聯繫業務方面也發揮較強的功能。這種掛戶企業已經十分類似集團公司的模式(羅衛東,2002)。

幾乎與掛戶經營同一時間出現的股份合作制,被視為是中國農民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及鄉鎮企業之後的第三項制度創新。先從政策的角度來回顧溫州推行股份合作制的過程。1987年11月,溫州政府頒佈〈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這是中國第一份關於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地方性法規,它也成為1992年國家農業部制訂〈農民股份合作企業暫行規定〉的藍本,1988年溫州政府又制訂〈關於私營企業和股份合作制企業若干問題的通知〉。到1997年為止,溫州政府相繼頒佈了八個發展股份合作制經濟的地方性政策文件,以扶持和引導民營經濟發展。在1987年,在地方政府的爭取下,中央政府在溫州成立「溫州農村改革試驗區」,試驗內容的第一項就是「放手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股份經濟」。同年10月,溫州政府頒佈〈溫州私人企業管理暫行辦法〉,是中國第一份關於私營企業的地方性法規,象徵著溫州的私人企業的合法收益得到保障,並且擴大了民營企業自主權的制度環境(陳國權、麻曉莉,2004b)。

所謂的股份合作制,是指三戶以上的勞動農民,按照協議,各自以資金、實物、技術等自願組織,聯合經營,有固定經營場所及設施,能獨力承擔民事責任,並經依法批准成立的經濟組織。就其組織形式而言,做為股份經濟,企業產權歸屬於參加企業聯合的勞動者;作為合作經濟,企業的主體由參加聯合的農戶家庭共同組成,農戶是合作經濟的基礎。在溫州,股份合作制採取「按勞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的原則。「按資分配」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股息,股息略高於銀行的貸款利率;二是股金分紅,規定這部分金額不得超過稅後利潤的25%。如此便保障了股東一定的投資效益,又在收益總額上給予合理限制,使這部分消費基金留在企業以轉為生產發展基金。「按勞分配」,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工資、津貼;二是由企業在稅前列支,統一按工資總額的17%提支職工保險,按工資總額的11%提支工資附加費,以用於職工醫藥費、困難補助費等;三是企業在

稅後利潤中提取 10%，用於集體福利和職工獎勵基金（李雲河、鄭子耿，1994）。股份制，維護了私營企業在產權上的私有性質；合作制則結合了集體經濟的特徵。溫州股份合作制企業的誕生，迴避了當時對「姓社姓資」的爭議，從而取得了合法性地位。

第三，1988-1991 年，是責難性政治約束中的整頓期。從 1980 年至 1988 年，溫州民營企業的工業產值所佔比例由 1% 增加到 41%，這引起了左派人士的恐慌。溫州民營企業的經營活動在 1980 年代中後期，出現了假冒偽劣的產品質量問題，在全國造成惡劣的影響，因而引發大規模對溫州民營經濟模式的爭議與批評。同時，這也導致 1990 年國家七個部委聯合進駐溫州柳市鎮，對低壓電器的假冒偽劣產品進行全面整頓，對低壓電器實施「打擊、截堵」的方針。溫州地方政府此時所採取的因應措施，一方面與中央部委進行反覆談判，另一方面對低壓電器廠家採取「疏導、扶持」的方針，並且堅持發展民營經濟的政策目標。由於地方政府的作為，舒緩了各方利益之間的矛盾。在這個階段，溫州地方政府著重加強對股份合作制企業進行引導和整頓市場秩序，並開始構建新的政策制度以規劃民營企業的發展。例如，在 1989 年頒佈〈關於股份合作企業規範化若干問題的通知〉，1990 年先後頒佈〈批轉“關於股份企業規範化若干政策規定的報告”的通知〉及〈關於堅決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就查處樂清縣生產銷售無證、偽劣產品的通知的意見〉，1991 年先後頒佈〈關於治理整頓市區勞務市場、加強外來勞動力管理的通知〉和〈關於加快我市市場建設的決定〉等文件。

第四，1992 年迄今。為了完善溫州發展民營經濟的制度環境，溫州市委及市政府在 1992 年 12 月，同時推出了兩個重大政策：〈關於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的決定〉和〈關於鼓勵個體和私營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決定〉。1994 年，溫州政府提出「質量立市、名牌興市」的目標，制訂「358 質量系統工程」。之後，民營企業的規模逐漸壯大，地方政府開始以政策引導重點骨幹企業為中心的企業規模化經營，如在 1996 年制訂〈關於扶持重點骨幹企業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1997 年的〈溫州市企業集團組建和管理實施辦法〉等政策文件。

上述的四個階段，描述了溫州民營經濟在產權制度上的變革，其中掛戶經營與股份合作制的出現，象徵著政治與經濟在溫州地區共生演化的結果。事實上，民營企業始終是溫州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行動者。

以 2003 年溫州市的工業產值結構來看，廣義的民營企業，包含股份制企業、股份合作制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一共佔了全部工業總產值的 91.8%；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所佔的比重最低，只有 3.1%。另外，三資企業佔了 5.1%¹⁰。

¹⁰ 溫州幾乎吸引不到外資，當地所謂的「外資」，絕大部分是溫州本地人到國外闖蕩一番，然後拿著外國護照回來開辦企業，所從事的產業與當地也沒什麼區別（焦蓉，2004：96）。

從這項數據，可以瞭解民營企業對溫州經濟結構中的比重與貢獻。見表 1-3。

表 1-3 2003 年溫州市工業經濟結構

企業類別	單位數(家)	工業總產值及比重		
		產值(億元)	比上年增長%	比重(%)
全部工業	140,220	2676.95	17.7	100
國有企業	62	39.65	-30.4	1.5
集體企業	1,171	43.54	29.3	1.6
三資企業	511	136.28	11.2	5.1
股份制企業	3,740	568.13	28.4	21.2
股份合作制企業	13,382	538.66	19.4	20.1
私營企業	9,930	585.33	24.1	21.9
個體工商戶	111,424	765.36	10.1	28.6

資料來源：引自焦蓉（2004：44）。

目前，溫州市形成 27 個國家級的特色產業生產基地（見表 1-4），擁有 12 個中國馳名商標、16 個中國名牌產品、65 個全國免檢產品、246 個省及著名商標和名牌產品。8 個品牌成爲 2004 年中國 500 個最具價值品牌，溫州在中國馳名商標和中國名牌產品的擁有數量在全國同類城市中名列前茅。

表 1-4 溫州市國家級工業產業基地

名稱	地域	名稱	地域
中國不銹鋼無縫管生產基地	龍灣	中國制筆之都	鹿城、龍灣
中國五金潔具之都	龍灣	中國鎖都	鹿城
中國拉鏈之鄉	永嘉	中國鞋都	溫州
中國商務禮品生產基地	蒼南、平陽	中國休閒鞋生產基地	里安
中國汽摩配之都	里安	中國塑膠薄膜產業基地	里安
中國服裝名城	溫州	印刷包裝及醫藥機械全國產銷基地	里安
中國眼鏡生產基地	鹿城	國家火炬計畫智慧電器產業基地	樂清
中國塑編之鄉	平陽	中華全國鑽頭（建工）生產基地	樂清
中國合成革之都	龍灣	中國電子元器件產業基地	樂清
中國泵閥之鄉	永嘉、甌海	中國精密模具生產基地	樂清
中國（溫州）剃鬚刀生產基地	鹿城	中國斷路器產業基地	樂清
中國金屬外殼打火機生產基地	鹿城	中國防爆電器生產基地	樂清

中國電器之都	樂清	中國休閒服裝名城	樂清
中國印刷城	蒼南	中國皮都	平陽

資料來源：中國溫州，<http://www.wenzhou.gov.cn/gb/wz/survey/chinese/03/userobject1ai16963.html>

另外，從溫州各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產業結構，也可以看出溫州市偏重傳統產業的發展格局，見表 1-5。

表 1-5 溫州市工業園區及其重點發展方向

園區名稱	重點發展方向
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	◇應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整合現有產業
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濱海園區	◇新興產業（含出口加工區 2 平方公里） ◇光機電一體化、電子資訊、新材料和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及其相關聯產業 ◇高端傳統產業（文具、包裝印刷、水暖器材）及相關聯產業
溫州鹿城輕工特色園區	◇ 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工業、高端的傳統產業 ◇（眼鏡、剃鬚刀、金屬外殼打火機業）及其相關聯產業
浙江省甌海經濟開發區	◇ 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高端的傳統產業 ◇（制鎖業、眼鏡、金屬製品）及其相關聯產業
浙江省里安經濟開發區	◇機械製造、汽摩配件、高分子材料及其製品，電子資訊、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品；改造提升現有產業
浙江省樂清經濟開發區	◇新型電氣元件、高中壓電器及成套設備、電子專用設備及儀器儀錶、通訊、網路產品、電腦軟體及應用系統等相關聯產業
樂清虹橋科技園區	◇新型電子元器件、模具、鑽頭及相關行業
甌北泵閥工業園區	◇泵閥、高端鞋服及相關行業，應用高新技術及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現有產業
溫州扶貧經濟開發區	◇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改造提升現有傳統產業
浙江省平陽經濟開發區	◇包裝機械、金融設備、醫用明膠及高性能、綠色精細化工產品系列，承接溫州市區梯度轉移產業
平陽昆陽服飾工業園區	◇服裝、服飾業、燈具、工藝禮品及其相關聯產業
蒼南靈溪示範工業園區	◇自動化儀錶、印刷、傢俱業、承擔扶持西部山區經濟等綜合工業，承接溫州市區梯度轉移產業

資料來源：中國溫州，<http://www.wenzhou.gov.cn/gb/wz/survey/chinese/03/userobject1ai16963.html>

四、研究問題

中國地方經濟發展路徑的選擇，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極大(王紹光、胡鞍鋼，1999；劉雅靈，1999；吳柏均、錢世超等，2006)。改革開放之前，塊狀經濟與三線建設的制度設計，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區域的差異化。在毛澤東時代，中央政府基本上控制著財政的分配，富裕省分必須將他們收入的大部分上繳中央政府，而落後省分被允許保留其全部收入，還能從中央政府那裡得到額外補貼。但是，中央政府並非始終保持強而有力的汲取能力，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均有所變化(王紹光、胡鞍鋼，1999)。

優惠政策的主要目的在於吸引外資投資，但無疑地，對沿海地區的優惠政策是造成中國區域差異惡化的重要因素 (ibid.)。此外，中國國內市場的分裂，也與中央的分權政策及三線建設有關。在以省為計畫單位追求各省內部的經濟滿足以達到全國的供需平衡，以及動用國家力量進行大陸邊遠地區重工業建設，造成中國以省和地區為主的塊狀經濟，從而分割大陸整體的國內市場，因此，計畫經濟的制度遺產造成中國當前國內市場分割與區域壁壘的現象。改革之後的財政承包促使地方政府進一步保護地方經濟利益，進行進口替代政策以確保地方市場，則又促使國內市場分割與區域壁壘現象的更加惡化(劉雅靈，1999)。各省市競相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經濟發展格局，實則為計畫經濟的發展思維。

若依照王紹光與胡鞍鋼的分析¹¹，蘇州與溫州皆是中央政府對外開放政策下的受惠者，就產業結構而言，應該會出現類似的結果(如外資出口導向)。然而，很明顯的，這兩個城市在 1980 年代之後所採取的發展路徑是不相同的。針對這種地方經濟發展「趨異」的現象¹²，大致可歸納如下幾個分析取向。

首先，是計畫經濟對地方政治造成的制度慣性。一般認為蘇州地方政府是一個強勢型地方政府，在計畫經濟時期有較強的國家投資，城市的國有企業與農村的社隊工業及後來的鄉鎮企業相對發展良好，能夠有效吸收蘇南的勞動力，集體經濟的再分配功能造成幹部與群眾相對擁有較佳的收入與生活品質的保障，以及政治意識的社會化，從而對蘇州的地方政府與經濟體制產生合法性的認同。至於溫州地方政府則被視為弱勢型地方政府，這種地方政府治理型態源自於該市的領導班子在 1949 年之前是當地的游擊隊，溫州的地方領導為尋求地方的支持，放棄過於激烈的集體政策，改以較溫和的政策代替之。中共建國之後，他們順利成

¹¹ 也包括錢穎一和許成鋼提出的「深 M 型經濟管理組織」的觀點。

¹² 目前有些觀察指出蘇州與溫州有著制度「趨同」的現象，特別是在 2004-2005 年左右。如蘇州地方政府開始大力扶植民營企業，提倡創業精神，希望透過民營經濟以提高人均收入，並降低過份依賴外資的風險。即使蘇州的民營企業數量超過溫州，但絕大部分是由過去的鄉鎮企業轉型而來。至於溫州，在新任的市委書記王建滿領導下，提出所謂「一號工程」，要加強溫州的外商投資。從這兩個角度，蘇州與溫州似乎有著制度趨同的情況。即使如此，但限於觀察時間太短及路徑依賴的限制，我認為蘇溫兩地的此種政策效果，仍有待觀察。

為地方的領導，相較於其他地方是由中央派任的地方領導，溫州領導班子比較重視地方的利益，在此後二十多年的政策左傾下，他們仍然以溫州的地方利益為優先，適度放鬆地方經濟的活動（劉雅靈，1992；引自吳親恩，1997：46）。再加上計畫經濟時期，國家對溫州的投資過少，在國有與集體經濟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政治意識型態的社會控制便顯得寬鬆，因此，溫州地方政府對於民間的個體私營活動的態度，也往往呈現模稜兩可，甚至做為中央與民營經濟活動之間的轉轍器。

其次，地方政府與企業產權的分析。這個分析取向將地方政府視為具有發展性格的行動者，是一種發展型的地方主義（Oi，1992、1999；Walder，1995；吳國光、鄭永年，1995）。受到財稅政策改革的影響，地方政府有了更強的誘因追求地方的經濟成長，因此地方政府透過成立農工商總公司，大力開辦企業，並由幹部參與、主導鄉鎮企業的生產與流通，以及利潤的分配。產權私有化成為檢驗此一論述的主要戰場。吳介民（1998）認為，由於中國缺乏對產權的法律保障，因而出現企業產權的非正式私有化，造成所謂的「虛假產權關係」；亦即國有及集體企業儘管維持著公有制的外貌，但實際掌握企業者為官僚與幹部。陳志柔（2001）以社會網絡概念為基礎的在地制度，著重非正式制度限制對鄉鎮企業財產權的解釋，並對產權私有化在制度趨同的理論預設提出質疑。他指出，蘇南的鄉鎮企業財產權變遷是建立在地方官僚為核心的權力網絡之中，此一特色乃是根植於蘇南較強的地方政治所造就的制度環境之中。劉雅靈（2001）認為吳江的鄉鎮企業在1980年代的快速發展，並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效能，也不完全是市場轉型、虛擬產權的非正式私有化、政治權力商品化、與社會鑲嵌關係所推動，而是原有地方制度特性、短缺經濟結構，以及鑲嵌在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下的投資飢渴慣性使然。吳江政府在推動工業化進程時，發揮了「地方政府經濟法人」的功能，直接介入企業的生產經營，並提供地方經濟發展所需的各種資源。然而，地方政府這種干預的作法不僅造成地區之間缺乏產業分工的惡性競爭，而且造成企業單位固定資產投入的產值下降，利潤增長趕不上虧損幅度，因此一旦市場出現疲軟以及中央政府緊縮銀根時，吳江便暴露出投資盲目與效益不足的窘態，在1990年代後集體企業乃宣布破產，從而進行了所謂「強制完成的私有化」。方孝謙（2002）指出對鄉鎮企業變遷的社會學研究利基在於利用新制度論的分析架構引導下，專注於「非正式制約」、「親身交換」、與「企業轉制」的分析，換言之，他強調華人關係網絡在鄉鎮企業產權制度分析上的重要性。周雪光（2005）則提出「關係產權」作為社會學分析中國產權制度的替代方案。他認為「產權是一束關係」，在中國轉型經濟社會中，企業鑲嵌在各種制度基礎上，而且非市場機制的交換活動普遍存在，企業需要在各種非市場的關係紐帶中尋找生存空間。在這些條件下，建立在產權上的身份和關係紐帶，為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適應性優勢。總之，產權制度的分析取向，指出不同產權制度的安排將對地方經濟型態造成不同的制度環境。

最後，地方政府與外資關係。此一分析取向，大多認為外資乃是做為全球化經濟力量的化身，從供應面的角度，一方面說明地方政府如何提出優惠政策及完善基礎設施，以配合外商投資的需求，同時強調地方政府與外資（台商）利益共生的結盟關係（邢幼田，1996；吳介民，1996；冷則剛，2002；康智凱，2002；郭萬達、朱文暉編，2003；柏蘭芝、潘毅，2003；Keng and Chen，2004；張家銘，2006）。另外，也有從需求面的角度探討地方政府與外國直接投資的關係，如黃亞生（Yasheng Huang，2003；中譯：錢勇、王潤亮，2005）提出制度基礎論的觀點，強調中國對外國直接投資（FDI）需求的三種特殊制度特徵：首先，企業的政治性主從次序，它偏重於無效率的國有企業，而以最有效率的私人企業為代價；其次，私人企業的產權顯著地不受法律保障；最後，中國經濟的條塊分割。中國的這些制度特徵導致各省分對外資的龐大需求，而中國企業的全面缺乏競爭力狀態，主要是由缺乏效率的中國經濟體制和金融體制，及其實踐和政策所造成。除了上述的兩種分析取向之外，部分研究者也著重探討外資（台商）在中國投資生產活動與其全球化的連結程度（鄭陸霖，1999；吳翰有，2001；楊友仁、夏鑄九，2004；楊友仁，2005；Steinfeld，2005；Saxenian，2005；Lee，2006）。總之，此一分析取向企圖完成全球化與在地化兩個過程的辯證，全球化代表著是一個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同質化過程，但是「全球化的過程終究必須在地方的層次上實踐，而這一實踐過程並非全然只是外在力量的支配而已，相反地，會因著地方社會與經濟空間的特殊性，而在地方落實過程中，產生不同地方的效果；而這樣的在地化效果與空間實踐則又進一步對於全球化過程與社會空間有所轉化」（徐進鈺、鄭陸霖，2001）。

在以上三種主要分析取向的基礎上，我認為要探討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多樣性，有必要從政治與經濟共生演化（Zhou，2000）的觀點出發，將分析焦點放在生產體制（production regime）的結構與變化，以進行地方經濟發展路徑的分析與比較。換言之，透過對政治、經濟與社會諸種制度的分析，瞭解各個行動者如何在既有制度的路徑依賴基礎上協調出一套對應的制度環境，以實現各方的利益滿足，以及制度的合法性。而在這個協調的過程中，從而也表現出異質性的地方發展路徑。

在上述的關懷之下，本文提出的研究問題，首先是在同形的地方政治與經濟組織型態與對外開放條件下（沿海地區），是什麼制度因素造成地方經濟發展路徑的「多樣性」？其次，不同的地方，蘇州與溫州，就其地方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制度安排，是透過什麼機制取得生產體制的合法性？此一具有合法性的生產體制，在1990年代之後，如何回應對外開放與內部產業結構調整等兩股力量的變化？最後，他們各自產生了什麼制度後果？我將以比較研究的策略，分別針對蘇州與溫州的個案，提出我的回答。

五、結論

如同 Fred Block 的提醒：

「歷史是一個不斷開展的制度選擇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們沿著特定的方向來重塑並改革社會制度。在最寬廣的意義上，這其實就是一個政治過程，各擁不同利益的團體，競相要去影響其結果。然而，這些相互競爭的團體間力量的消長，會受到社會中具有說服力的觀念所影響。也就是在這個點上，社會理論在協助人們形成對特定制度的想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不論社會中過去權力競逐的結果為何，社會理論能夠形塑人們對於不同社會制度與社會實踐之間「契合」程度的認知。」(1990；鄭陸霖、吳泉源，中譯，2004：64)

「要在既定的歷史情境中證實任一種方式的價值，只能對微觀經濟選擇、社會管制、與政府行動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謹慎仔細的分析才能完成。」(ibid.：106)

若要指出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多樣性，究竟是由哪些制度因素與相關行動者的建構下而產生變化，除了必須掌握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後的歷史脈絡之外，將經濟生產組織（如廠商），及其所構成的生產體制、地方政府治理角色及社會文化等組織制度及行動者作為一考察對象，分析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North，1990；劉瑞華，中譯，1995）對行動者選擇的限制性與能動性，是有其必要的。因為經濟是一個制度化的過程（Polanyi，2001），這個過程提供了統一性和穩定性，並且創造了在社會中具有特定功能的結構。而市場經濟往往是在政治與社會力量的干預下，特別是政治權力的積極介入，才被創造出來（Polanyi，1954；中譯，黃樹民等，1999）。中國市場經濟的建構，落實在地方的層次，特別能看到這個過程。

由於本文改寫自本人的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提出問題更甚於解決問題，內容尚不完整，敬請會議的發表，吸收前輩們的意見與指導，以協助我逼問出更好的提問方式來進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一切的理論概念以證實某一方式的價值，契合中國經濟改革的社會制度與社會實踐之間的落差與願

參考文獻：

王紹光、胡鞍鋼 1999，《中國：不平衡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北京：中國計畫出版社。

- 方孝謙 2002,〈解釋鄉鎮企業變遷的制度與關係理論?社會學的利基何在?〉,《台灣社會學刊》
- 冷則剛 2002,《資訊產業全球化的政治分析:以上海市發展為例》,台北:印刻。
- 李雲河、鄭子耿 1994,〈溫州模式〉,周爾鑾、張雨林編,《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Pp.94-129
出版社。
- 吳大聲、居福田 1994,〈蘇南模式〉,周爾鑾、張雨林編《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Pp.24-67。
社。
- 吳介民 1996,〈同床異夢:珠江三角洲外商與地方之間假合資關係的個案研究〉,李思名等主編
《展面面觀》,Pp.175-218。台北、香港: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與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
聯合出版。
- 1998,〈中國鄉村快速工業化的制度動力:地方產權體制與非正式私有化〉,《台灣政治學
- 吳柏均、錢世超等 2006,《政府主導下的區域經濟發展》,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
- 吳翰有 2001,《全球產業與在地鑲嵌:台商資訊產業在蘇州生產協力網絡之建構》,東吳大學社
- 吳親恩 1997,《中國大陸鄉鎮企業產權改革:中央、地方與企業的互動——以溫州和蘇南為觀察
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國光與鄭永年 1995,《論中央—地方關係:中國制度轉型中的一個軸心問題》,香港:牛津大學
- 邢幼田 1996,〈台商與中國大陸地方官僚聯盟——一個新的跨國投資模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59-182。
- 林毅夫、蔡昉、李周 2000,《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台北:聯經。
- 周怡 2006,《中國第一村——華西村轉型經濟中的後集體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周雪光 1999,〈西方社會學關於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研究狀況評述〉,涂肇慶、林益民主編,《改
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Pp.139-169。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2005,〈“關係產權”:產權制度的一個社會學解釋〉,《社會學研究》,2005年3月(Vol.1)
- 徐進鈺、鄭陸霖 2001,〈全球在地化的地理學:跨界組織場域的統理〉,《都市與計畫》第28卷第
- 柏蘭芝、潘毅 2003,〈跨界治理:台資參與昆山制度創新的個案研究〉,《城市與設計學報》,15
台大城鄉所。
- 陳志柔 2001,〈中國大陸農村財產權制度變遷的地方制度基礎:閩南與蘇南的地區差異〉,《台灣
- 陳國權、麻曉莉 2004a,〈地方政府制度創新與民營經濟發展——溫州制度變遷的軌跡與分析〉,《中
年第6期(總第228期)》,Pp.83-87。
- 2004b,〈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公共政策創新——溫州地方政府政策的演變與分析〉,《公
年第一卷第一期(2004年2月)》,Pp.50-56。
- 郭萬達、朱文暉編 2003,《中國製造:『世界工廠』正轉向中國》,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 康智凱 2002,《東莞的崛起:台商的企業群集與地方政府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
- 焦蓉 2004,《溫州私營經濟發展之研究(1978-2003)》,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家銘 2006,《台商在蘇州: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考察》,台北:桂冠出版。
- 張輝鑫 出版年待查,〈蘇州、溫州經濟發展比較分析與我市發展的
http://www.tt91.com/wenzhang_detail.asp?id=80443&artclass2=%E6%96%87%E7%AB%A0%E4%9A%81
- 楊友仁、夏鑄九 2004,〈跨界生產網絡的在地化聚集與組織治理模式:以大蘇州地區資訊電子業

- 學報》，36:23-54。台北：台灣大學地理學系。
- 楊友仁 2005，《電子業台商之跨界生產網絡與中國大陸地方發展研究—蘇州與東莞的比較》，國立中央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 新望 2004，《村莊發育、村莊工業的發生與發展：蘇南永聯村記事（1970-2002）》，北京：三聯書店。
- 鄧小平 200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Pp.370-38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費孝通 1987，《江村經濟》，香港：中華書局。
- 1994，《鄉土重建與鄉鎮發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劉志彪、張曄 2005，〈蘇州與溫州：國際化模式的比較及展望〉，《溫州論壇》，2005年第6期。
- 劉雅靈 1999，〈中國國內市場的分割——計畫經濟的制度遺產〉，《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第17卷第1期。
- 2001，〈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蘇南吳江經濟興衰的歷史過程〉，《台灣社會學刊》，26卷第1期。
- 鄭陸霖 1999，〈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移〉，《台灣社會學研究》，第17卷第1期，頁1-46。
- 羅衛東 2002，〈溫州民間企業的成長——路徑和機理的初步分析〉，史普川等編，《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研究》，Pp.63-112。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錢穎一、許成鋼 1997，〈中國非國有制經濟出現和成長的制度背景〉，甘陽、崔之元編《中國改革與開放的理論與實踐》，Pp.41-78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謝立新 2005，〈工業化模式：泉州、溫州、蘇州的比較研究〉，http://www.lnzw.gov.cn/document_show.asp?ID=12
- 蘇州市統計局編 2006，《2006 蘇州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蘇州市“兩個率先”課題組 2006，《蘇州之路：“兩個率先”的實踐與思考》，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
- 江蘇省經濟貿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jsctc.gov.cn/big5/jsjmw/sxjmx/userobject1ai40877.html>
- Albert, Michael. 1991. *Capitalism vs. Capitalism how America's obsession with individual achievement has led it to the brink of collapse*. New York: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中譯：莊武英，《兩種資本主義》（1997）。
- Dore, Ronald. 2000. *Stock Market Capitalism: Welfare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d Block. 1990.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譯：鄭陸霖、吳泉源譯，《後工業機會：一個批判性的經濟社會學論述》。台北：群學出版社。
- Hall, Peter A. and David Soskice. eds. 2004.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llingsworth, J. Rogers. And Robert Boyer. 1997.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Actors and Social Systems in the Firm” Pp.1-47. in Hollingsworth, J. Rogers. And Robert Boyer. ed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Yasheng. (黃亞生) 2003.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北京：新星出版社。
- Keng, Shu. (耿曙) and Chen-Wei Chen. 2004. “Farewell to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the Market in China” 發表於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辦「中國大陸基層民主與社會」，2004年11月2-3日。
- Lee, Chuan-Kai. (李傳楷) 2006. “Taiwan-Suzhou: Industrial System and Cross-Border Regionalization”

- 東海大學主辦 Branding with Innovation: Taiwanese Firm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2006年6月
- Nee, Victor. 1989. "The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36-70.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譯：劉瑞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台北：時報文化（1995）。
- Oi, Jean C.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125:103-28.
- Oi, Jean C. 1999. *Rural China Take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lanyi, Karl. 1957(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Press. 中譯：黃樹民、石家因、廖立文，《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北：遠流出版
- Polanyi, Karl. 2001.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Pp.31-50. in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2001.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Oxford: Westview Book Press.
- Saxenian, Annalee. 2005. "Brain Circulation and Capitalist Dynamics: Chinese Chipmakers in the Silicon Valley-Hsinchu-Shanghai Triangle." , Pp. 325-351., in Victor Nee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2005.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einfeld, Edward S. 2005. "Cross-Straits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Catch-Up: How Vulnerable Is Taiwan to an ascendant Mainland?." , Pp.228-279. in Suzanne Berger and Richard K. Lester eds. *Globalization and Competitive Strength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y*. New York: M.E.Sharpe.
- Walder, Andrew.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譯：龔小夏，《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的組織結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 Walder, Andrew.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the Rural Industri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22(Sept.), 263-301.
- Wank, David L. 1999.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UK: Routledge Press.
- Whiting, Susan. 2001.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itley, Richard. 1999. *Divergent Capitalisms: The Social Structuring and Change of Business Systems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ou, Xueguang.(周雪光)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 Panel Data."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5, No. 4. (Jan. 2000), Pp.1135-1174.